

经
济
发
展
理
论
研
究
丛
书

经济发展理论中 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一种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框架

国家重点图书

邹薇 · 著

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谋求经济发展是经济建设的目的。

为了有助于达到此目的，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学说，

回顾前人的经济发展思想，并进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是我们希冀完成的任务。

武汉大学
出版社

国家重点图书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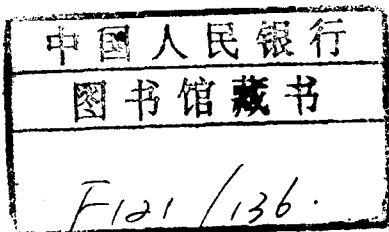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一种分析中国经济改革
与发展的理论框架

邹薇 著



Z0031456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框架/邹薇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9
(国家重点图书)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
ISBN 7-307-02978-2

I. 经… II. 邹… III. ①新古典经济学—研究 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091.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308 号

E+66/25

责任编辑：刘爱松 责任校对：李桂珍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发行：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32千字 插页：4
版次：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2978-2/F·647 定价：21.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序言

我们编写《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有三个目的:

第一,深入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从殖民地和附属国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成批地出现在世界各地之后,考察、分析如何保持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并如何实现全面而合理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学说日益系统化而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自引进我国,不过短短十几年,但影响很大。人们认识到,它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作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深入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启发并完善我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第二,系统整理发展经济学兴起以前的经济发展思想。我们认为,系统整理以往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它为主线写出经济学说史是有很大的学术意义的。其理由是:有利于较全面地理解往昔经济学家的思想;有利于深化对西方经济学内在缺陷的认识;有利于看清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渊源。这件工作虽然是尝试性的,但却是值得去做的。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钻研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遇见、今后还会遇见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而在过去几

十年中我们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令人难忘的教训。如何从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成分,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和鉴别,探索切合我国实际的发展经济学,是有待于我们奋力去完成任务。

根据我们与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协议,我们决定在“八五”期间编写这一套《丛书》。现已确定选题计划,并将计划落实到有关人员,准备分专题写出 10 部以上的专著,每年出版 2 至 4 部。

我们切望,《丛书》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协助,对不当之处给予指正和批评。

谭崇台

1993 年 9 月 10 日

国家重点图书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谭崇台

副主编

刘光杰 傅殷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颖 刘光杰 冯金华

李中伟 郭熙保 傅殷才

谭崇台



目 录

第一章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1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制度	1
第二节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经济发展 主题的转变	9
第三节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	21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拓展经济发展研究的几个 重要理论领域	27
第五节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简评	33
第二章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研究的重现： “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44
第一节 斯密经济学的制度因素研究	44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中的制度研究	61
第三节 经济学的三个时代：“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72
第三章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制度思想	76
第一节 以分工制度为核心的生产制度理论	77
第二节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框架	86
第三节 马克思的动态制度变迁观	94
第四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重新研究	99
第一节 康芒斯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99

第二节	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理论	105
第三节	康芒斯制度理论简评	109
第五章	发展经济学中早期的制度研究及其扩展	113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研究	113
第二节	关于农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研究	122
第三节	关于贸易与产业组织的制度研究	131
第四节	二元经济的制度研究	139
第六章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上)	150
第一节	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产权分析思路	151
第二节	《企业的性质》的性质	157
第三节	《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	165
第四节	科斯理论的意义与评议	181
第七章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下)	190
第一节	交易与交易成本研究的扩展	190
第二节	产权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扩展	202
第三节	交易成本-产权研究对企业理论的新扩展	220
第四节	交易成本思路的偏颇与缺陷	231
第八章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历史经济学(上)	236
第一节	制度及其本质	236
第二节	制度为什么重要	244
第三节	制度研究的动态化:制度变迁理论	257
第九章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历史经济学(下)	271
第一节	新历史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 历史的制度的分析	271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历史计量学、热动力学与生理学	280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新历史经济学与路径依赖理论	289
第十章	经济发展中的寻租活动与寻租理论的发展	308
第一节	寻租活动与寻租理论的着眼点	308
第二节	寻租分析的兴起	314
第三节	寻租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	317
第十一章	寻租与经济动态化的研究	330
第一节	竞争性寻租:外生局部均衡模式	330
第二节	政治制度与寻租:内生一般均衡模式	340
第三节	寻租与经济发展	349
第四节	对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寻租研究的简评	363
第十二章	分工、交易与经济增长	366
第一节	作为一种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分工	366
第二节	分工、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379
第三节	分工、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	395
第十三章	经济发展的微观制度基础	419
第一节	微观经济行为假定的扩展	419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作为一种激励性的 制度安排	428
第十四章	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442
第一节	腐败行为和中国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	442
第二节	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448
第三节	关于腐败的动态数理模式研究	460
第四节	反腐败:一种制度性的努力	466

第十五章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分析 ·····	474
第一节	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	474
第二节	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特征与路径优化·····	486
参考文献	·····	502
后 记	·····	524

第一章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这一思潮中,经济学家一方面充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因此,这个发展经济学新阶段的特点在于,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历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制度

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阐释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揭示国家兴衰的奥秘?这是经济学中古老而又常青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关注的核心。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推进与扩展。

综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人们不得不在某种似乎“神秘的”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许多显赫一时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17世纪西方世界迅速步入平稳持续的经济发展轨道,而曾经称雄于世的东方国家却从此衰落?为什么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东亚的经济绩效明显优于南亚、地中海地区、南撒哈拉非洲、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为什么同是在东亚,“四小龙”自1965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纷纷步入“新

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创造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成就，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却差强人意，至今仍停留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为什么同样在中国，改革前增长速度总体上并不慢，而经济实绩却很差，陷入“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中；而改革后，人还是那些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经济发展却迅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诸如此类的问题，长期以来激起了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家的浓厚兴趣。诚如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所说：“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试图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并分析经济变化的长期过程。就像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曾提醒我们的那样，亚当·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①

如何解开经济发展之谜？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是根本动力，有的则把发展之源归结为资本积累，还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作出了详尽的定量估计。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则对古代帝国的兴衰语焉不详，把经济发展的历程简单概括成“弱肉强食”，对无数复杂的经济演化过程未作深入分析。显然，既有的经济与历史分析涉及了经济发展某些方面的特征。然而，不论这些分析如何精细、巧妙和实用，都未能说明经济发展的根源。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要求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的收

^① Meier, G. and Seers, D. (eds),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益或成本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利得与亏损，社会的收益或成本是带给社会的影响。私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之间不一致，即“外部性”，是指其他人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就获得当事人付出努力换来的某些收益或逃避支付某些应付的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明确界定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因此，经济发展中十分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获取创新的收益？如何确保对社会有益的创新活动对于私人而言也是有利可图和乐于为之的？显然，这决不是仅从技术角度考虑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考虑到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为经济活动创造了怎样的成本收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什么是制度？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它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由此展开的框架。制度的定义似乎天生地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把每个人比作运动员，把经济发展比作比赛，那么，制度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比赛的规则，安排了比赛的场所，并且执行仲裁，以保证经济发展这场“比赛”能顺利进行。因此，诺思(North, D.) 多次指出，制度提供了个人与资本存量、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可以说，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规则性和秩序性，增大信息流量，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便有效地利用一国资源，而这个目标看来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

发展中国家对于构建与完善制度基础的兴趣似乎并非自今日起。世界银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助了许多列入“制度发展”名目下的项目。然而，人们通常把“制度”视同于公共管理、行政组织等，其实这只涉及了制度内涵的某些侧面，甚至只是很肤浅的层面。与这种认识相对应，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宿命论，即似乎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及其带来的发展问题无能为力；另一种是逃避论，即回避那些难以

定量分析的制度因素，转而关注于那些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分析的技术因素，乃至至于奢望制度缺陷能够忽略掉或自动消失。这些肤浅而片面的观点，在经济发展实践上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忽视对基本的制度框架的“软”投资，而只突出特定的能带来短期增长效应的“硬”投资。结果，在旧的制度框架下，市场经济得不到顺利运行，经济发展时常陷于困境中，这在拉美、中非、西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重新抬头。一则是由于实践上的经济非均衡，即不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日益显著；二则是由于理论上的困惑，即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视野狭窄，只限于对外生技术变化的关注，单一突出市场配置机制，而把各种制度因素都视为既定的和外生的，因而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制度背景十分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借用奥尔森（Olson, M.）的比方来说：“它们追溯了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潮流，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受到阻碍。”^①因此，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实践历程的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发展观：不仅要注重资源配置，而且更要注重有效地利用这些已配置的资源；不仅要制订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注重构造出执行政策的恰当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再度突出制度分析，这种“古典经济学复归”的潜流，成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中引人注目的特征，对于经济发展源泉的探索从此也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制度究竟怎样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过去很长时期

^① M·奥尔森：《大国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第23页。

中，制度学派^①只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却没有给出富有分析性的说明。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同时还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原本就缺乏制度基础，因而使制度分析难以融入传统理论中去，制度的重要性成了一句空话。在对经济发展源泉的探索中，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走向了具体化。从理性上讲，制度几乎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哪里有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哪里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制度可以通过确定规则，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反应都能作出准确的预见；制度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塑造发展的动力，促使人们的个别努力转化成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的、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活动；制度可以通过正规的法令规章和非正规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等，来影响市场运作，决定市场配置机制的效率；制度还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涌现，塑造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可以说，制度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无处不在，有效的组织和制度安排造成了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经济发展活动的一部分，使经济发展的愿望变成现实。

在现实中，制度主义思路为经济发展的历程提供了与众不同的阐释。譬如，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来，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这可以说是当代世界经济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理论上对它作出的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单纯强调市场配置机制

^① 包括以凡勃伦 (Veblen, T. B.) 为首的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J. K.) 等人对制度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制度研究与当代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存在某种内在的继承性，而加尔布雷思等人的所谓“新”制度研究与当代的继承性不强，所以，本书对前者将作一些重新分析，而对后者则略而不论。

的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二是单纯强调政府有效干预的结构主义的思路，三是强调其地理上的集中性的地理主义思路。但是，从制度角度看，这些解释都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三个极为明显的特征：一是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且持续久。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一般很少低于4%或5%，许多经济中都曾出现过两位数的高增长，有的甚至持续了几年、几十年的高增长，这很难用政府干预来解释，因为经济发展毕竟是在市场环境中发生的。二是东亚各个经济的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相当高，远远超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据世界银行统计，“四小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达到世界上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快的级别。钱纳利（Chenery, H.）估计，这些经济的增长至少一半得自全要素生产率而非资本积累。可见，新古典式的增长要素分析法对于东亚经济的解释力十分有限。三是东亚各经济体不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四小龙”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相比，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而且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福利状况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因而地理主义的解释也不具有普遍性。

那么，东亚经济何以出现奇迹呢？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制度结构和制度创新来看，东亚经济最大的共同点不在于地理位置，而在于它们基于相似的传统、历史经验以及长期的相互移民、贸易与投资等活动，逐步在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方面形成了一些共通性。在取得成功的东亚经济中，各经济体都建立了相当稳定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鼓励和保护竞争的市场制度与自由企业制度，熔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于一炉的文化制度等等。正是在这些制度基础的支撑下，它们顺利地实现了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化，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①所以，

^① Ranis, G., "Another Look at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Sept., 1995.

东亚奇迹既奇又不奇，“奇”在于这些经济从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并且保持了不衰的发展势头；“不奇”在于它们既没有非常有利的自然条件，也没有经历激烈的“破坏性创造”过程，看上去，“每个经济体只不过是把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运用得更充分、更有效罢了。”^①然而，恰恰是从它们能把看似平常的事情做得更好这一点上，反映出了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东亚各个经济体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先后出现了汇率大幅度贬值，股价下跌，失业增多，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等十分不利的现象。东亚的经济危机给“亚洲虎”的经济发展史投下了一道阴影，也引起了理论界对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有的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东亚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传统生产要素的扩张性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有的人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东亚经济中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还有的人把危机归咎于国际游资的冲击，等等。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表明，造成东亚经济出现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制度方面的因素。

1. 东亚经济兴起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强政府”，蕴含了潜在的危險性，那就是，许多经济体中的政治制度都有集中和专制的倾向，政府驾驭市场的尺度难以把握。一旦政府的干预过度，便极易滑向专制政治的泥潭（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出现的情形），而这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2. 基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东亚经济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地依靠垂直的“管制-服从”的体制和窗口指导等非正规的措施，这些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管制方法曾经是十分有效的，但

^① The World Bank,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